

歐美關於伊拉克危機的分歧及其淵源

2002年9月12日，「九一一」事件一周年之際，美國總統布什 (George W. Bush) 以「十年的謊言與挑戰」為題向聯合國安理會公布了美國有關伊拉克違反聯合國決議的報告，將伊拉克問題正式提交到聯合國的論壇之上。自此，要不要以軍事手段解決伊拉克危機就成為國際社會討論的焦點。以法德為代表的一部分歐洲國家及絕大部分歐洲民眾持反對意見，相對則是以美英為首包括一部分東歐國家的主戰派。怎樣看待歐美在伊拉克問題上的分歧？主戰與反戰雙方各有那些理據？雙方的分歧僅僅是在處理伊拉克危機上的方法與策略之分，還是存在着更為深刻的利益與價值上的分歧？本文自然難以對所有這些問題作出回答，僅期望從目前伊拉克危機及其國際性的討論所顯示出的一些傾向性的問題出發，梳理歐美分歧的脈絡及其可能的影響。

「九一一」事件後，法國《世界報》主編哥龍巴尼在頭版寫道：「我們都是美國人」，充分表達了法國人同仇敵愾的義憤。但不到一年之後，歐洲輿論的主流聲音卻變了調門。哥龍巴尼用同一題目出了一本書，題目雖然一樣，但後面卻加了一個問號——「我們都是美國人？」，精神因而大異其趣。

首先，從現象層面上看，十分引人注目的是，從「九一一」慘案到目前，歐洲民意在對美國的態度上發生了重大轉變。「九一一」事件之後，世界震驚。作為美國的最主要同盟，歐洲對美國受到恐怖主義攻擊同病相憐。歐洲各國政府與輿論全力支持美國事後發動的反恐鬥爭。當時，法國最重要的報紙《世界報》(Le Monde) 主編哥龍巴尼 (Jean-Marie Colombani) 在頭版寫道：「我們都是美國人」，充分表達了法國人對美國遭到慘烈襲擊的同仇敵愾的義憤。然而，「九一一」事件不到一年之後，法國、德國甚至歐洲整個輿論的主流聲音卻變了調門。曾經發出過「我們都是美國人」的強音的《世界報》，如今被一些美國學者戲稱為反美報紙。而哥龍巴尼本人後來又用同一題目出了一本書，題目雖然一樣，但後面卻加了一個問號——「我們都是美國人？」，精神因而就大異其趣。

歐洲與美國的分歧表現在一系列國際問題上。在處理中東衝突問題上，美國更為支持以色列的強硬政策，而歐洲則堅持衝突只能通過政治對話獲得解決。在海牙國際刑事法庭問題上，美國站在美國主權不容侵犯的立場上，以美國

人必須具有國際司法豁免權作為認可這一法庭的條件，而歐洲人則認為海牙國際法庭是世界法制秩序的奠基條件之一，任何國家都不能超然於這一法制秩序。歐洲與美國在環保問題上也存在分歧，布什政府單方面否決《京都議定書》使歐洲一直耿耿於懷。歐美在對待轉基因產品和經濟貿易問題上也存在重大分歧。

上述分歧一些屬於歐美傳統的利益摩擦的範圍，另一些則源於歐美對國際秩序、地球生態等問題的不同態度，如海牙國際法庭及《京都議定書》。這些分歧大多由來已久，但在美國因「九一一」事件發起全球反恐行動以後，尤其是阿富汗戰爭結束以後變得日益明顯甚至激化。而在對待進攻伊拉克問題上，歐美分歧達到了前所未見的程度。

按照今年2月份全歐洲範圍內的一次民意測驗，歐盟十五國有82%的被訪者反對美國在沒有聯合國安理會授權的情況下進攻伊拉克；即使在其政府明確宣布支持伊拉克戰爭的東歐，也有75%的人反對美國對伊動武。歐盟各國甚至有54%的人對如今美國在世界範圍內的行動持否定態度。需要指出的是，與傳統的歐美政策分歧不同的是，在伊拉克問題上，民意比政府走得更遠，在法德是民意推着政府走；而在英國、西班牙等，民意同政府的調子背道而馳。元月30日，以英國為首的歐洲八國首腦共同簽署了一項公開聲明，呼籲歐洲應該在解決伊拉克危機上同美國保持一致。在這項聲明上簽字的八國首腦分屬於五個歐盟現成員國和將於2004年加入歐盟的三個國家。歐盟成員中，除了英國首相布萊爾 (Tony Blair) 外，還有西班牙首相阿斯納爾 (José Maria Aznar)、意大利總理貝盧斯科尼 (Silvio Berlusconi)、葡萄牙總理巴羅佐 (Durão Barroso) 及丹麥首相拉斯穆森 (Anders Fogh Rasmussen)。屬於東歐的三個國家領導人是捷克總統哈維爾 (Václav Havel)、波蘭總理米萊爾 (Leszek Miller) 和匈亞利總理邁傑希 (Péter Medgyessy)。然而，即使在這些國家，民意調查也顯示了民眾強烈的反戰情緒。如82%的匈亞利人、79%的丹麥人、84%的英國人、80%的西班牙人、72%的意大利人反對美國單邊進攻伊拉克。無論自己政府的立場如何，80%的歐洲人對歐洲的傳統盟國美國的一次如此重大的行動持反對態度，這在歐洲歷史上是罕見的，既非任何反美主義的情緒可以解釋，也大大超出了傳統的反對所有戰爭的和平主義者的小圈子^①。

歐美在中東衝突、海牙國際刑事法庭、《京都議定書》等問題上存在由來已久的分歧。需要指出的是，與傳統的歐美政策分歧不同的是，在伊拉克問題上，民意比政府走得更遠，在法德是民意推着政府走；而在英國、西班牙等，民意同政府的調子背道而馳。80%的歐洲人對傳統盟國美國的一次如此重大的行動持反對態度，這在歐洲歷史上是罕見的。

二

歐洲民意為甚麼如此一面倒地反對發動伊拉克戰爭？這大致可以從戰爭的合理性、法理程序、戰爭的後果等方面來分析。

到目前為止，以美英為主的主戰派的公開理據有大致三點：一、伊拉克薩達姆 (Saddam Hussein) 政權是世界上最為專制、暴烈的政權之一。這個政權不僅肆無忌憚地鎮壓國內反對派，甚至對本國的少數族群如庫爾德人和對伊斯蘭教的什葉派使用化學武器。同時，薩達姆政權也有對外發動侵略戰爭的前科，如80年代持續九年的兩伊戰爭，90年吞併科威特等。二、伊拉克擁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並一再違反聯合國有關伊拉克問題決議，拒不消除此類武器。三、伊

拉克支持巴勒斯坦自殺性恐怖組織並同本拉登 (Osama bin Laden) 的「基地」組織 (al Qaeda) 有聯繫。

從反戰一方的立場來看，上述三點並不足以成為發動戰爭的理由。薩達姆政權的獨裁與專制性質，在歐洲沒有人懷疑。然而，專制是否就應該遭受武力攻擊？薩達姆政權是否當今最為危險的獨裁政權？同被美國看作是「邪惡軸心」國之一的朝鮮公開向國際社會進行核訛詐，為甚麼不應該先解決朝鮮核危機？第一次海灣戰爭之後，伊拉克一直受到國際社會制裁，美英戰機一直在伊拉克南部巡邏，其對國際社會及其鄰國的威脅已經大打折扣。同時，美國方面也沒有能夠拿出證據證明薩達姆與本拉登的聯繫。總之，歐洲公眾看不到再打一次海灣之戰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從法理程序的角度，無論是歐洲民意還是政府其實都有共識，即堅持只有聯合國安理會才是決定在世界範圍內進行軍事行動與否的合法機構。公開發表聲明支持美國立場的歐洲八國，也認為應該由安理會最終授權打擊薩達姆政權。美國則不然，它認為一旦自己的利益受到損害甚至威脅，就有權單獨決定對伊用武。從西方陣營內部講，這是單邊主義與多邊主義的分歧。單邊主義與多邊主義之爭是大西洋兩岸的傳統爭論。二戰以來一直主導西方的美國與力圖堅持外交獨立的法國在北約內部決策程序上的爭論，就體現了這種傾向。

不過，現今的單邊與多邊爭論空前激烈，在一部分輿論看來，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美國總統布什本人及其班子的傲慢強橫帶來的。布什從「九一一」事件以來，一直堅持一種善惡二元論的思維方法。將反恐稱作是新的十字軍東征，將伊拉克、伊朗、朝鮮稱作邪惡軸心國，斷言不支持美國就是美國的敵人等等。這種不是天使就是魔鬼、不是朋友就是敵人的簡單而又輕狂的斷言，是無法讓歐洲人接受的。法國前外長韋德里納 (Hubert Vedrine) 說得再明白不過了，他逕直將美國的邪惡軸心國觀點稱作是過於簡單化的世界觀。最近美國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 (Donald Rumsfeld) 將德國與法國稱為「舊歐洲」，而將支持美國立場的各國稱為「新歐洲」，也是布什善惡二元論的邏輯演繹。布什政府所提出的所謂先發制人的概念，也更加強化了美國單邊主義的霸權形象。

不過如果將此次伊拉克之戰同1991年的海灣戰爭尤其是1999年的科索沃戰爭相比，歐洲反對進行第二次海灣戰爭的原因則明顯超出了道德與程序之爭。1991年的海灣戰爭是一個比較完美的國際正義之師的個案，其實老布什總統及其盟國既持有聯合國的尚方寶劍，又具有討伐侵略的道德正義性。戰爭雖然沒有推翻薩達姆政權，但很可能正是因為戰爭適時而收，該地區迅速恢復穩定，沒有留下嚴重後患。1999年的科索沃戰爭可以說是一個程序上不合法，但具有道德正義性的戰爭。當時北約發動對科索沃的軍事干預並沒有聯合國安理會的明確授權。但是，北約出兵是為了制止塞爾維亞的種族清洗行動，戰爭導致米洛舍維奇 (Slobodan Milosevic) 政權倒台，南斯拉夫跨入民主政治，科索沃由聯合國接管，巴爾幹地區走上良性循環道路。

此次伊拉克之戰，不能說完全沒有道德上的正義性，但是正義性不充分。按照在法國、德國兩地都有重要影響的歐洲綠黨人物科恩—本迪特 (Daniel Cohn-Bendit) 的說法，需要區分獨裁政權的不同階段，當一個獨裁政權處於進攻即侵

單邊主義與多邊主義之爭是大西洋兩岸的傳統爭論。不過，現今的爭論空前激烈，很大程度上是由於布什及其班子的傲慢強橫帶來的。布什從「九一一」事件以來，一直堅持一種善惡二元論的思維方法。法國前外長韋德里納逕直將美國的邪惡軸心國觀點稱作是過於簡單化的世界觀。

略狀態時，必須予以打擊或者遏制，而當專制政權處於收縮、退卻狀態時，則應該以非武力手段解決問題。換句話說，1991年薩達姆出兵侵略科威特時，聯合國出兵干預是正當的；當年北約對前南斯拉夫進行的軍事干預，正是為了制止當年米洛舍維奇對科索沃穆斯林人發動的種族清洗，是一次地地道道的人道干預。而如今伊拉克政權並沒有主動對外出擊，對庫爾德人的鎮壓也處於收斂階段，因而，國際社會應該以外交手段解決伊拉克危機。

從地緣政治上考慮，歐洲擔憂此次伊拉克戰爭很可能只會加深中東地區的危機。美國一方面忽視對巴勒斯坦和以色列衝突的調停，一方面卻派重兵進攻伊拉克。在法國政治學界有着廣泛影響的地緣政治問題專家阿茲內 (Pierre Hassner) 甚至表示：假如再打一場海灣戰爭有利於西方與阿拉伯世界的緩和，有助於中東局勢的穩定，我可以同意進攻伊拉克；但目前看不到任何這種可能。相反，在目前的局勢下，發動一場針對伊拉克的戰爭，很可能被認為是一場由猶太教、基督教和殖民者聯合發動的攻擊穆斯林和被殖民者的戰爭。這一戰爭將激化宗教矛盾，加劇文明衝突，很可能使以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為指南的恐怖主義惡性泛濫^②。

另外，對於戰爭的目的，美國政府智庫中一些人物也有通過戰爭推翻薩達姆政權，在伊拉克建立民主，從而一舉改變中東甚至整個阿拉伯世界專制保守局面的說法。一些支持此論點的學者也援引二戰後盟國在日本及西德建立民主體制的歷史事實來論證此舉的可行性。對此歐洲包括美國學界多持懷疑態度。二戰後盟國在日本及西德建立民主制度的努力無疑是成功的，但日德當時的現狀和歷史傳統都無法與今天的伊拉克同日而語。

首先，二戰後美軍對日本的佔領及盟軍對西德的共管，有着不容置疑的道德正義性。對在二戰中犯下戰爭罪，給周邊國家乃至本國人民留下累累血債和無盡災難的戰爭發起國實行管制，不僅是德日周邊國家的意願，也獲得日德本國民意的認可。從法理程序上講，正是二戰後一系列國際機構尤其是聯合國的建立，使得世界看到了邁向一種法制秩序的可能。換句話說，德日戰後的民主建設有助於國際社會走向法制軌道，而今天布什總統發動的第二次海灣戰爭卻有損於以聯合國為主體的法制體制。

從文化傳統上看，日德現代史上都有民主傳統，民主制度在此兩國都有着自己的文化甚至制度根基，與其說是以美國為首的戰勝國從外部強加民主，倒不如說恢復民主更為確切。日本與西德的社會種群、宗教譜系也比較同質，不像伊拉克既受到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的威脅，又面臨庫爾德人的民族獨立訴求和遜尼派和什葉派之間的教派之爭的挑戰。同時，就德國的情況看，西德與東德兩種社會制度的並存，也是民主制度得以在戰後西德鞏固的重要條件。

三

美國與歐洲在文化淵源、價值體系、制度安排等基本方面有着共同性，但在經濟利益、軍事戰略上一直存在重要分歧。本文無意鋪陳歐美在經濟層面的

一些學者援引二戰後盟國在日本及西德建立民主體制的歷史，論證推翻薩達姆，在伊拉克建立民主的可行性。但日德當時的現狀和歷史傳統都無法與今天的伊拉克同日而語。德日戰後的民主建設有助國際社會走向法制軌道，而今天布什發動的第二次海灣戰爭卻有損以聯合國為主體的法制體制。

摩擦，但認為從地緣政治層面簡單回顧一下二戰後法美關係的演變，卻是對理解今天法美在聯合國安理會上的對抗大有裨益的。

戰後的法國外交是以戴高樂主義為指針的。東西方冷戰時期，戴高樂 (Charles de Gaulles) 治下的法國第五共和一方面堅定不移地站在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自由陣營一邊，一方面不為冷戰格局所束縛，尋求法國自主外交之路。1958年法國拒絕美國在法國領土上部署導彈，獨立開發核子武器；64年與中國建交；65年戴高樂在金邊講話明確反對美國發動越南戰爭；66年退出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一直到67年譴責以色列發動第三次以阿戰爭等等，都是這一獨立外交路線的具體演繹。戴高樂所創的這一外交路線以實用主義為主導，因而靈活多變，但核心是一方面拒絕國際霸權，無論是來自蘇聯還是美國；另一方面拒絕將世界分成壁壘分明的板塊結構，無論是以意識形態還是以宗教文化來劃分。隨着戴高樂退出政治舞台和東西冷戰對峙加劇，法國的外交政策自80年代初發生了方向性的變化。密特朗 (François Mitterand) 執政伊始，採取了靠近美國的措施，如加入世界七強首腦會議等。希拉克 (Jacques Chirac) 執政後，法國返回北約，接受美國指揮北約的既成事實。然而，無論是戴高樂國內政治上的反對派密特朗，還是被稱為戴高樂精神傳人的希拉克，都是實用主義的忠實信徒。法國採取靠近美國和返回北約的政策，絕非是以放棄自主外交作為代價的。希拉克決定法國重返北約實有玩特洛伊木馬遊戲之嫌，為的是從北約內部說服歐洲國家發展歐洲自己的國防體系，最終擺脫美國的制約。然而，「九一一」之後國際反恐大潮下世界發展的趨勢，似乎正在粉碎法國眼中的世界藍圖。

冷戰結束之後，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各國發動了三次重大軍事干預行動：91年海灣戰爭法國積極參與，義無反顧；99年科索沃戰爭法國力促美國參戰，凱旋而返；2001年阿富汗之戰，北約摩拳擦掌，雄心萬丈，試圖參與美國的雪恥之役。然而，此時布什上台後的美國政府已是政治保守主義的一統天下，阿富汗之戰，美國拋開北約，自取所需，僅帶上英國這個最為忠實的小夥伴，大挫了北約其他歐洲夥伴的面子。而此次伊拉克之戰醞釀之初，美國就擺出甩開北約和聯合國安理會的架式。對於法國來說，美國這種單邊主義的作法，不僅事實上已使北約成為美國一國的工具，而聯合國也可能遭受到同樣命運。從這個意義上講，法國在安理會與美國鬥法，既是在捍衛自己的民族尊嚴，也是在維護聯合國的權威。

德國此次同法國站在一起反對美國的單邊主義，是德國外交的一個新現象。德國戰後外交兩原則——同美國站在一邊和不在法美之間作選擇——都被打破。德國的這一變化有現總理施羅德 (Gerhard Schröder) 個人氣質上的原因，但最重要的是德國社會氛圍的變化：第一，五十年的戰後深刻反省，使得德國人感到卸下了歷史重負，應該在國際政治舞台上發出自己的聲音；第二，德國和平主義傳統正在捲土重來。

不過，目前歐美在解決伊拉克危機上的分歧，並不僅僅局限於外交層面。眾多觀察家指出，此次歐美分歧正在超出傳統的利益分歧，而逐漸走向某種價值分歧。而這種深層的價值分歧，如果不能得到及時修正，將會對整個世界的走向發生重大影響。

希拉克執政後法國返回北約實有玩特洛伊木馬遊戲之嫌，為的是從內部說服歐洲國家發展自己的國防體系，擺脫美國的制約。然而「九一一」之後國際反恐大潮下世界發展的趨勢，似乎正在粉碎法國的世界藍圖。法國在安理會與美國鬥法，既是在捍衛自己的民族尊嚴，也是在維護聯合國的權威。

縱觀法國近期報刊，在提到美國時以帝國、強權相稱已是司空見慣。如果誇張一些，筆者可將目前歐美在國際問題上的一系列分歧概括為歐洲主張法治，美國主張強權；歐洲主張文明對話，美國鼓吹文明衝突；歐洲強調外交斡旋，美國偏愛武力威脅；歐洲希望討論磋商，美國固執於單邊主義。進一步甚至可以說，歐洲今天已經進入所謂可持續發展和世界治理的後現代，而美國還停留在強權、實力的政治現實主義的舊時代。自然，這種概括有點漫畫性質，但並非子虛烏有。法國著名國際關係學者拉依迪 (Zaki Laïdi) 就指出，「九一一」事件之後，美國的方向同歐洲所主張的經濟治理、政治一體化的方向背道而馳。而這一發展趨勢正在使歐美的利益衝突向價值衝突的方向演進^③。

歐洲學者自然不否認，美國有着堅實的不可非議的民主制度，人權、自由這類普世價值觀在美國也深入人心。對於多數評論者來說，造成目前美國與歐洲分歧的主要原因，不是價值和制度層面的問題，而是如今沒有制衡的世界格局。美國的單邊主義是因為美國太強大。法國前外長維特林在談到文明衝突問題時就表示，「九一一」事件並沒有開啟一個時代，是由於東西冷戰的結束，才使我們進入了新時代。因為，從那時起世界失去了兩極制衡^④。

歐洲輿論對美國偏離法制秩序的擔憂不僅僅從伊拉克問題起。在歐洲看來，中東衝突遲遲得不到解決同美國偏袒以色列有直接關係。以巴衝突在以色列利庫德集團右翼領導人沙龍 (Ariel Sharon) 主政以來越演越烈，歐盟堅決譴責巴勒斯坦自殺式恐怖活動，但也強烈譴責沙龍以一個民主、法制國家之名對巴勒斯坦平民發起的進攻。以色列長期不執行任何聯合國安理會決議，在美國的庇護下，無視國際社會的批評，將自己置於國際法制秩序之外。而美國布什政府此次甩開聯合國安理會的作法，使得歐洲人擔心美國正在以色列化。

歐洲人心中的世界新秩序應該以法治和現有國際組織 (如聯合國) 為基礎，而不能以實力為準繩，這同美國目前布什政府的主導意識形態有着直接衝突。美國卡內基基金會著名國際戰略專家卡根 (Robert Kagan) 就美歐存在着這種價值分歧指出，美國同歐洲在國際秩序、地緣政治上的分歧，並非是歐洲嚮往和平而美國醉心武力。他認為，美國與歐洲看世界的不同思路，主要來自於歐洲的衰落。歐洲主張和平、對話、法治的取向並非來源於古老的傳統，而是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所產生的新傳統。十九、二十世紀的歐洲同現在的美國一樣，崇拜武力和強權，那時的歐洲各國傾軋、爭霸，以強權瓜分世界，對話、法治根本無從談起。而當時相對弱小的美國同現在的歐洲一樣，更多地主張對話和談判，以外交手段解決衝突。現在的歐洲和當時的歐洲有甚麼不同？他認為：歐洲當時具有實力，因而以強權解決問題，現在的歐洲用武力已力不從心，因而也就只好鼓吹對話。他甚至告誡歐洲人：如今歐洲可以鼓吹法治、對話，正是由於美國人為其提供了實力基礎。沒有美國人的存在，歐洲就無法抵禦來自邪惡國家的進攻，沒有美國的干預，歐洲也無法解決歐洲本土的衝突，如科索沃戰爭。按照卡根的立論，歐洲目前所唱的理想主義的、貌似高尚的田園詩般的和平頌歌，實乃是一種忘乎所以的烏托邦。

卡根認為，美國固然是從自己的現實利益出發，但歐洲何嘗不是？就拿歐洲反對美國進攻伊拉克來說吧，歐洲雖然以國際規則、多邊主義為理由，反對

眾多觀察家指出，此次歐美分歧正在超出傳統的利益分歧，而逐漸走向某種價值分歧：歐洲主張法治，美國主張強權；歐洲主張文明對話，美國鼓吹文明衝突；歐洲強調外交斡旋，美國偏愛武力威脅；歐洲希望討論磋商，美國固執於單邊主義。歐洲今天已經進入所謂可持續發展和世界治理的後現代，而美國還停留在強權、實力的政治現實主義的舊時代。

向伊拉克用兵，但實際上歐洲所害怕的，則是歐洲會成為伊斯蘭主義報復的首當其衝的目標。歐洲從過去強大的霸權國家，正在淪落為今天世界秩序重組的看客的身份。卡根以政治現實主義來論證目前歐洲與美國分歧的實質。在他看來，美國的邏輯是強者的邏輯，歐洲的邏輯是弱者的邏輯，而美國無非是繼承了歐洲的古老傳統而已^⑤。

卡根指出歐洲的國際戰略取向同其利益密切相關，這自然是真切的，但他的立論本身卻提出了一系列基本問題：當代的世界秩序同十九、二十世紀有無區別？強大並且堅持自由、民主、人權的美國對世界和平有否義務？維護世界和平的最有效方法是武力還是其他？世界現存的包括聯合國、世貿組織在內的一套制度秩序還有否意義？在美國人的世界圖景中，人權、法治、公正還佔有甚麼樣的位置？等等。

十九、二十世紀的歐洲同現在的美國一樣崇拜武力和強權。歐洲今天對和平的渴望，對法治秩序的追求，對理解對話的提倡，並非僅僅因為歐洲的衰落。歐洲對自己文化中的「惡」的反省，直接來自兩次世界大戰對歐洲的肆虐。過去歐洲的強權不能成為今天美國的強權辯護的理由。

從價值層面看，歐洲今天對和平的渴望，對法治秩序的追求，對理解對話的提倡，並非僅僅因為歐洲的衰落。歐洲對自己文化中的「惡」的反省，直接來自兩次世界大戰對歐洲的肆虐。今天的歐洲相對於美國雖然弱小，但在世界範圍內仍是強大的一極。過去歐洲的強權當然不能成為歐洲今天堅持強權邏輯的理由，同時也不能為今天美國的強權辯護。美國歷史上曾有屠殺印第安人的紀錄，今天的美國人能夠以此為榮嗎？美國以奴隸種植園起家，今天還可以為此辯護並借屍還魂嗎？站在歐美以外的民族的立場上，美國能夠為了自身利益，在世界上重演驅逐異教、種族屠殺的歷史嗎？沒有價值準則的世界是動物的世界。美國強大的主因，難道不是由於美國的憲政、民主等一套制衡系統嗎？歐洲到目前為止一直是美國最可靠的同盟，不僅僅是因為美國強大，更重要的是美國同歐洲分享同樣的價值準則和民主制度。正是從這個角度，法國一些反戰的著名學者認為，他們反對此次伊拉克之戰正是為了捍衛美國所代表的民主、自由的價值準則。法國著名評論家於利亞(Jacques Julliard)指出，如果美國在沒有聯合國安理會授權的情況下攻擊伊拉克，那無異於是對整個西方包括美國自己的犯罪，是對美國自己所代表的價值準則的摧毀性打擊^⑥。

註釋

- ① 民意指數均見法國2月13日《世界報》。
- ② 上述科恩一本迪特及阿茲內言論均引自元月1日《世界報》發表的有關訪談。
- ③ Zaki Laïdi, "L'Amérique se déploie, l'Europe se replie", *Le Monde*, 6 August 2002.
- ④ *Le Monde*, 18 July 2002.
- ⑤ 卡根此文發表於美國*Policy Review*，113期，法國*Commentaire*雜誌在2002年9月號全文轉載。
- ⑥ *Nouvel Observateur*，27 February 2003.

陳 彥 法國巴黎大學歷史學博士，現任職法國國際電台。